

“脑立方”受追捧，成功焦虑是内因

眉间尺

近来,有一个搞右脑开发的“脑立方”培训机构粉墨登场。该机构号称参加完培训,孩子的专注力、记忆力、创造力都会大大提升,比如1小时能做诗20首,甚至可以蒙着眼睛辨别色彩。虽然培训费高达数万,但望子成“神童”的家长趋之若鹜。当然,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场花样翻新的骗局。

有专家认为,家长受骗,是被急功近利之心蒙住了双眼。其实,这当然是原因之一,更内在的原因恐怕还是当今社会上,尤其是家长中流行的成功焦虑。参加“脑立方”培训的家长直接目的,应该是提高孩子的智力。提高智力的目的,是提高学习能力和成绩,进而成为“人生赢家”。

追求成功,无疑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社会前进的动力。但一个社会如果充满成功

焦虑,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不但会阻碍人们对成功的正确理解,而且会扭曲社会的文化生态,让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功焦虑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个体心态依托于一定的文化土壤。成功焦虑与这些年渐成气候的竞争文化大有关系。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人们以超越别人、强于他人作为成功,成功与竞争成了连体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人们就会希望拥有比别人更强的能力;为了代际竞争的胜利,家长自然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超越于常人的“神童”。

在“脑立方”骗局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一句流行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就在几年前,新华社已经报道过类似的骗局,但骗子的伎俩依然屡试不爽,秘诀就在于钻了这种文化的空子。因此,要让此类骗局绝迹,最根本或许还在于

改变我们的文化心态,以平常心看待成功,以理性和韧性追求实实在在的进步。

如“脑立方”事件所显示的,成功焦虑在家长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教育领域也最容易泛滥。在这个问题上,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管理主体不明、措施乏力,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有鉴于此,应进一步明确校外教育培训不仅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它固然要依照市场规律行事,但既然提供的是一种事关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的特殊商品,就应该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两个效益产生矛盾时,经济效益应服从于社会效益。为此,任何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仅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是不够的,还应接受属地教育部门的统一管理,建立健全资格准入、培训内容审查等方面的制度。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当根除骗术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切断它的传播渠道

是最急迫的工作。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情况恰恰是最不乐观的。即使“脑立方”的骗局已被主流媒体曝光,打开网络搜索页面,键入“脑立方”三个字,首先跳进眼帘的依然是一堆浮夸的广告,那些客观报道和评析却无法占据足够吸引关注的位置。这大概是所谓竞价排名的结果吧。实际上,竞价排名、价高者就可以占据更有利的话语地位,本身就是对网络世界自洁功能的损害,也是成功焦虑广泛流行的推手之一。因此,在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的当下,防止本应造福于人的网络平台成为骗子的帮凶,构建一个清朗的舆论空间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脑立方”事件又一次对培育积极健康的社心态敲响了警钟。只有对症下药,缓解成功焦虑,成功的阳光才能真正普照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下一代的身上。



近日,名为“长沙头条”的认证微博账号称,湖南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要求高考统招招生缴纳2000元“预录费”,规定时间内不交费的学生将拿不到录取通知书、不被录取。 视觉中国

各抒己见

连日来,大学生误入传销的新闻让人痛心,也让人反思,此类事件接二连三是因为年轻人涉世未深、有待教化,还是传销套路太深、无法抵御?

观点速递

歧视非名校毕业生 折射以数值论英雄思维

一个社会的总体价值取决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只有充分尊重个体价值,社会的光谱才能更加多元、更加绚烂。对非名校毕业生的歧视,不过是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以数量和等级去划分人群、判定优劣的普遍思维方式的一种外现。对于“潜规则”的沾沾自喜和完全认同,也表明了这种“以数值论价值”的思维方式其实已经有了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

——常江(《新京报》)评某电视节目嘉宾称招聘会将非“985”大学生的简历直接丢掉

办好公共文化机构 考验公共部门诚意与初心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数量与服务质量,是衡量一个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文化氛围的重要指标。但这些机构要管理和运行好,并不容易。因为它们不同于其他一次性投入的公共服务,需要的是持续的人才、资金支持与管理更新。因为不具有一般行业“看得见”的经济回报,发展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考验公共部门发展文化事业的诚意与初心。

——朱昌俊(《中国青年报》)评上海两家区级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外流至旧书网

为“融资”而生的“共享经济”可休矣

衡量一种创新业态有没有商业价值的标准之一,是看这种形态是否真正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生。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一家共享单车面世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在考虑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交通问题。但发展到今天“颜色都不够用”的地步,恐怕动机就不再那么纯粹了:有些单车项目为了融资,根本不去考虑这种交通模式是不是在某些城市水土不服,最终难逃自取灭亡。

——赵广立(《科学网》)评共享健身房等共享经济新模式层出不穷

亡羊补牢式教育需改进

陈雍君

林华蓉等几起大学生卷入传销造成的惨案,使传销再次引发公众关注,触痛公众神经。据悉,相关单位如工商、公安以及民间反传销志愿者都认为,应该让反传销知识走进校园,如在9月份新生开学的时候做反传销宣传,以讲座、发放资料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这当然是应该做和抓紧做的,但大学生屡遭传销侵害也再次提醒我们深入思考:我们想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以及我们现在需要怎样的教育。

不难看出,容易被传销虏获的人,更相信机会主义,更急于求成,有赌博心态。在整个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理应是这种价值观的反对者,因为大学生身份意味着他们掌握了基本谋生技能,不需要靠机会和赌博谋求未来。但谁也不可否认,大学生群体中一定存在这样的人。那么,能否通过教育,尽量减少这部分人的比例,可以说是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了。所以残酷

点说,传销组织在替我们的教育检验成果。

因此有人感慨“这届大学生不行”,其实更多的,是随着时代的演变,摆在教育面前的任务越来越重,而又一直缺乏有力的解决之道。从前,学好文化知识,练就报效祖国的本领就算合格。今天,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同学们还需拥有更强大的价值观念体系,做好跟上社会发展节奏的准备。简而言之,今天的大学生需要有这样一种素质:能够以独立的个体融入社会,与社会形成良好互动。拥有这样素质的人,必然抛弃机会主义,认同奋斗逻辑,不会轻易被传销洗脑。

显然,这种素质已不是书本所能教,或者靠面考试能衡量的。要求我们的大学生普遍具有这种素质,早已不是理想,想国的幻想,而是眼前的实际需求了。那么反过来看看我们的教育,想要完成这个培养任务,至少眼前还远远不够。

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也都普遍依赖和重视应试教育,几乎一切以文化知识掌握程度为衡量标准。而对于大学生

适应社会的能力素质,则基本采取亡羊补牢式的教育。比如,今天开展“识别传销知识进课堂”活动,明天开个“认清校园贷本质”课程。就仿佛一群羊,时刻警惕被狼吃掉。勤勉是够勤勉,只不过走出羊圈时还是一只懵懂的羊。

假如,同学们在高校里能够以尽量小的代价体验招聘求职等职场环境,了解职场游戏规则;普遍参与扮演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或与校外密切互动,体会社会分工的属性和特点;诸如此类,能够广泛参与和体悟社会运行的真实规则,而不是被庇护于象牙塔,这样培养出的学生,相信起码不会被传销骗了去。

类似于反传销进课堂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效措施。若为百年树人计,还是要高校自身转变教育理念,积极探索新型教育手段和方法,在文化课基础上谋求学生们精神之强健、价值观之坚实,在一些无法考试的科目上多下功夫。如此,才有可能让一批批大学生成为传销乱象的破解者,而不是待宰羔羊。

世事纷杂,请别盲目责备受害者

卢阳旭

花季少女林华蓉误入传销,一去不返的消息引人唏嘘。许多人指责传销组织残忍至极。但也有不少人将矛头对准受害者本人,认为他们不够谨慎,甚至忍不住将一些负面标签贴在受害人身上。不出意外,同时也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后一种观点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心理学中有一个叫作“责备受害者”的概念,指那种将错误归咎于受害者自身的责任认定逻辑。在一件事情出来之后,持这种逻辑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世界上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就受害者碰上这事,一定是受害者本人有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蛋”是这种逻辑的通俗表达。

“责备受害者”逻辑的背后有两个隐

含假定:一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另一个更苛刻的假定是每个人在任何情境下都有能力摆脱、抵御可能的侵害。显然,在现实世界中这两个特别是第二个假定很难成立,它既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更忽略了个体在外部冲击面前的脆弱性。此外,由于人们通常认为“责备受害者”逻辑会让人觉得世界过于冷漠和刻薄,在人情和伦理上也不太容易接受。

毫无疑问,就某个具体的案例来说,受害者自己有疏忽甚至过失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责备受害者”逻辑就成立。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任何单维度的归因都要特别谨慎。更重要的是在宏观层面,“责备受害者”的逻辑不应该成为社会主流逻辑。除了它出现归因偏差甚至错误是大概率事件以外,其在

社会后果方面也存在很大漏洞。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轻松地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个人身上,那就意味着受害者之外的任何主体都没有责任、没有问题,都不需要改变,如果这样的话社会会改进又该从何谈起呢?

说到底,个人选择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当中完成的,个人自我选择过程和社会选择过程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特定个体选择在特定社会场景和遭遇特定事件的概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必须充分重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充分考虑个人能力、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合理界定个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将个体完全暴露在各种显在和潜在的社会风险当中,会让人们有难以承受的负重,而且一群焦虑的、脆弱的个体也难以汇聚出一个有活力、有温情的社会。

“冷冻人”苏醒前不妨思索伦理问题

王钟的

人体冷冻技术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科幻片里。而中国首例本土人体冷冻实施,使它高调进入公共舆论的讨论。尽管从现有的技术发展水平看,一个人在被实施人体冷冻之后,未来能否被成功唤醒,仍然是个未知数,但这并不妨碍公众对人体冷冻真正应用于以期待。

二十年前,生物克隆技术孕育出克隆羊“多莉”,人们开始密切关注克隆人可能造成的伦理问题。今天,人体冷冻涉及相似的伦理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冷冻数十年、数百年后被唤醒,那么他面对自己年老的子孙后代,该如何称呼?如何相处?传统上以年龄为尺度的伦理秩序,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科幻电影《太空旅客》就以人体冷冻技术为背景,设想了可能牵涉到的伦理问题。在一艘飞往深太空的飞船上,因为冷冻机器故障,一名乘客被提前唤醒,而且无法重新进入冷冻状态,此时距离目的地星球还有几十年时间。为了排解寂寞,他唤醒了另一位女乘客。但是,在飞船上,“时间”是没有价值的,让一个人提前结束冷冻,在飞船上白白耗费没有意义的人生,几乎是一种谋杀。

在现实层面,人体冷冻仍然是大胆的设想,谁也不知道几十年后这些被冷冻的躯体能否被唤醒。但是,伦理思考应当在技术前面,在技术成熟之后再迟迟探索新的伦理秩序,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几百年前,殖民者踏上新大陆,对技术水平落后的土著人大厮杀屠。这被视为理所当然。人们花了几

百年时间,才初步实现了种族、文明的平等,对殖民暴行的反思才被写入历史教科书。

冷冻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前面设想的代际身份认同问题,只是表象之一。更实质的问题是,经历了漫长的“休眠”,假设成功苏醒,被冷冻者能否适应新的文明和新的社会?彼时,跟他同年代生活的人的要么垂垂老矣,要么离开人世,也要在冷冻状态中,他可能需要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而因为技术和文明的迅速发展,他如何在新时代中生存也是个问题。如果一个清代末年的人穿越到当下,应该也会感到极大的不适吧。

在人类社会关系上,“冷冻人”会不会成为异类?他们会不会被隔离,被歧视?这也是需要审慎评估的问题。漫长的冷冻期,实质上让人实现了一趟时间旅行,但这趟时间旅行是不可逆转的。“冷冻人”既是技术的受用者,也是被技术远远甩在后边的群体。他们或许因此延长了时间尺度上的“年龄”,但并没有延长心理尺度上的年龄。他们可能要跟正常成长的人类争夺资源,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凡技术进入应用,技术就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影响因素。移动支付APP改变了人们的社交姿态,见面不再是社交的唯一方式;共享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又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从大的文明尺度看,这些人们当下热议的技术仅仅是很小的改变,但足以让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对于像人体冷冻这样堪称改变时代的技术,难道不应该未雨绸缪,通盘考虑一切伦理挑战么?

“天价”讲解员 有助树立导游职业标杆

张淳艺

网传的一份黄果树瀑布景区讲解员价目表显示,该景区特级讲解员一人一次收费1800元。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发关注。有网友认为这只是景区炒作的噱头,还有网友质疑一人一次收费1800元是否物有所值。其实,对于“天价”讲解员,我们不妨抱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首先,“天价”讲解员并非强制消费。除了1800元的特级讲解员,黄果树瀑布景区还有初级、中级、高级三种级别讲解员,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其次,相比普通讲解员,担任特级讲解员的是地理学、社会学方面的教授,在讲解过程中会加入更多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的介绍,还可以用多语言讲解。这些特色服务,比较符合一些高端游客、外国游客的需要。

对于“天价”教授讲解员,不应急于否定。高价讲解员是否值,还需要广大游客用脚投票。如果有价无市,不被消费者认可,在昙花一现之后自然会退出市场。如果“天价”教授讲解员经受过市场考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我国目前有80万注册导游人员,但以导游职业为终身全职工作的人少之又少。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导游人员被视为非技术人员而丧失自信。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导游职业被划分在第四大类,被排除在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第二大类之外。在许多从业者眼中,讲解员、导游等职业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无非是照本宣科地给游客们背诵一遍关于某一景点的讲解词,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而不少导游也疏于学习和积累,讲解不够准确,甚至靠影视作品和道听途说的八卦野史吸引游客。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曾抱怨,故宫的水池经常被导游误导说是“许愿池”,游客就往里面扔钱。

“天价”教授讲解员的出现,大大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对于改善职业群体形象,提升从业人员素质能够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教授、学者等高素质人才加入到讲解员、导游队伍中来,用专业知识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也为广大讲解员、导游树立了标杆,推动更多从业者见贤思齐,不断丰富知识结构,提升服务品质,实现自身价值。

论文抄袭之风为何屡禁不止

马爱平

近日,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厦门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蔡建春再次被举报:其申请厦门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涉嫌抄袭,被抄袭的文章来自于他的两篇硕士论文。

消息一经证实,着实令人尴尬。其实,这位导师不是第一个“致谢”也照抄不误的人。去年吉林大学一篇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陷入疑似大面积抄袭的尴尬之中,被抄袭的则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两篇论文不仅大部分文字几乎一模一样,文末“致谢”部分也照搬。

近些年,各种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屡屡被曝光,许多知名大学不能幸免。

下至本科生毕业论文,上至声达国际的学术论文,代写等学术不端的“毒瘤”难除,论文抄袭更是此起彼伏,甚至还出现了导师抄学生的尴尬局面。

实际上,关于学术规范和学风的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尽管教育部已经三令五申,并且不断地加大论文抽查的力度,2016年9月起更是施行了严格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但这种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丑闻,却一再发生。这背后首先是基本道德规范意识的缺失。做学问,自律要摆在第一位,抄袭者往往自身没有学术道德,缺乏基本学术规范意识,并不把抄袭当成严重的道德问题,让“天下文章一大抄”,成为他们的座右铭。

其次,学术道德的丧失、学术规范的缺

失,与量化的职称评审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有着密切关系。大学为什么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乃至舞弊丛生?量化的、刚性的指标体系是根源之一。一些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评职称和发表论文挂钩,他们才不惜冒险造假、抄袭,更不惜重金购买学术期刊版面。另一方面,一些学术期刊为了盈利,舍弃学术尊严,只要作者肯出钱,就为其发表论文,该有的文章审查和匿名审稿制度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学术抄袭是一种综合征,需要分清病症,综合治理。功利主义的指标化倾向,导致学术研究重量不重质。与此同时,在当前,仅仅依靠自律和高校内部约束,还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震慑。对已有的近乎泛滥的学术腐败,应用“重

典”,既要有道德约束,也要有法律约束。我国还需建立与健全学术执法、学术司法的机制,强化对学术违法的发现和追究力度,将法律约束与弘扬道德并重。

而对发现学术抄袭的困境,呼吁社会各界积极揭发举报,并在权威平台开辟举报、专题节目,向大众公示,同时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实施匿名保护,但举报内容则透明公开。这样一方面遏制学术腐败,惩恶不悛,另一方面又能避免不实举报对当事人的伤害。

唯有依靠大家共同努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全方位建立崇尚诚信的学术氛围,让抄袭者无路可走、无路可退,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学术腐败的土壤,还学术研究的清新之风、正气之风、诚信之风。